



《左氏春秋》叙事的 礼乐文化阐释

单良 著



《左氏春秋》叙事的 礼乐文化阐释

单良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左氏春秋》叙事的礼乐文化阐释 / 单良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5

ISBN 978 - 7 - 5161 - 5814 - 2

I. ①左… II. ①单… III. ①中国历史—春秋时代—编年体②《左传》—研究③礼乐—文化研究—中国—春秋时代 IV. ①K225. 04②K892. 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63781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罗 莉
特邀编辑 孙少华
责任校对 佳 文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4. 75
插 页 2
字 数 255 千字
定 价 52. 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左氏春秋》也称为《左传》，或《春秋左氏传》，在古代作为儒家经典被广泛地阅读、研究，也作为编年体史书的典范，被历代史家所借鉴、承袭。同时，《左氏春秋》又是最优秀的文学文本，历代缀文之士无不学习其文学精神与艺术表现手法。自司马迁、班固、荀悦到韩愈、欧阳修、司马光，无不学习、继承《左传》叙事艺术。

近几十年来，文学研究界关注《左氏春秋》中的人物形象塑造，从这一角度产生许多学术成果，有很多可贵的发现。但将《左氏春秋》视为文学文本，借鉴古代文论的成果，从文学发展进程的角度审视其叙事艺术，则会发现《左氏春秋》作为中国叙事文学文本的经典意义。

《左氏春秋》成公十四年云：“《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这是《左氏春秋》对《春秋》书法的精辟概括，也是作者对叙事艺术的深刻体悟和经验总结。这里所概括的叙事艺术原则与方法充分体现在《左氏春秋》文本中。

《左氏春秋》以历史事件为经，以人物为纬，运用高妙的艺术匠心和叙事手法构成绚丽多彩的画卷。在这经与纬的交织中，描绘出众多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描绘出众多暴戾恣睢、纵欲贪婪、阴险奸狡之人，展现出在各诸侯国政治、军事、外交交往与斗争中，各类人物的思想、性格，记述他们的命运，他们与历史事件、历史发展的关系。

如襄公二十七年，为缓和矛盾，避免战争，诸侯会盟于宋。但从筹备起，晋、楚、齐、秦四大诸侯便各怀野心，宋、鲁、邾、陈、蔡、曹、许等小国周旋于大国之间。作品描写主办方宋国艰难的斡旋，几大国对利益的错综考量，次第分明。作品集中描写晋、楚为争霸主地位的明争暗斗，既有楚人准备发难的紧张场面，又描写了叔向从容镇定，洞察彼此制衡因

素，因势利导，掌控事态的发展，以至于令尹子木对楚王曰：“宜晋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无以当之，不可与争。”在昭公元年会盟中，楚令尹公子围设楚王仪仗，引起各国卿大夫私下评议，鲁叔孙穆子含蓄委婉，郑子皮尖锐明朗，楚伯州犁辩解掩饰，其他参与会盟的卿大夫也各有感慨。作者记述他们生动的语言，表现出他们不同的态度，同时，也表现出众人对楚国政局发展的不同预测。

作者善于描写头绪纷繁的重大事件，善于刻画复杂关系中的人，在对比中写出人物的性格、修养，及其在历史事件中的作用。作者梳理各国历史资料，剪裁运化，独具匠心，而文笔简洁精练，描绘群贤音容笑貌，历历如在目前。《史通》称赞说：“《左氏》之叙事也，述行师则簿领盈视，咙聒沸腾；论备火则区分在目，修饰峻整；言胜捷则收获都尽；记奔败则披靡横前；申盟誓则慷慨有余；称谲诈则欺诬可见；谈恩惠则煦如春日；纪严切则凜若秋霜；叙兴邦则滋味无量；陈亡国则凄凉可悯。或腴辞润简牍，或美句入咏歌，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将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从宋至明清古文大家都对《左氏春秋》的叙事艺术做出了精辟的论述。这是中华民族文学理论的精蕴，是值得我们系统学习、借鉴的宝贵遗产，值得我们在《左氏春秋》研究中认真汲取和阐扬。阅读《左氏春秋》文本能获得极大的艺术享受，结合古代文论来研究《左氏春秋》可以得到可贵的艺术感悟与发现。

单良君矢志向学，遍读先秦坟典，于《左氏春秋》用力勤苦，颇有创获，撰成博士论文后，仍时时涵咏其间。我相信他会不断地有所发明。同时，我也坚信《左氏春秋》的叙事艺术会在更多青年才俊的研究中得到阐扬。

是为序。

许志刚

2015年1月10日

目 录

序 言	许志刚(1)
绪 论	(1)
第一章 《左氏春秋》文本的礼乐文化观照	(22)
第一节 礼乐文化语境中的《左氏春秋》文本	(23)
第二节 史官文化与《左氏春秋》文本书写	(28)
第三节 《左氏》之于《春秋》：叙事文本的文化超越	(44)
第四节 《左氏春秋》叙事的理想国图景	(65)
第二章 《左氏春秋》的叙事动力	(76)
第一节 礼：《左氏春秋》叙事的根本动力	(77)
第二节 《左氏春秋》叙事中的“天”	(88)
第三节 品德决定命运	(95)
第四节 民为神之主	(100)
第三章 《左氏春秋》与经典叙事范式的确立	(106)
第一节 时间表达与叙事意义	(108)
第二节 《左氏》叙事的鲁国视角	(114)
第三节 地点表达的叙事意义	(122)
第四节 《左氏》人物称谓的历史依据与主观倾向	(128)
第五节 评论语模式与思辨维度	(138)

第四章 《左氏春秋》叙事与人格美理想	(145)
第一节 周代人格生成的基本制约与叙事展现	(146)
第二节 仪与义：理想人格生成的两途	(151)
第三节 礼化人格的个性形式	(157)
第四节 绝对礼化与非礼化：人格范型的两极	(176)
第五章 《左氏春秋》叙事与诗乐艺术	(181)
第一节 周代诗乐艺术的礼制模式	(182)
第二节 乐舞艺术的叙事展现	(187)
第三节 《左氏春秋》语言观与引《诗》	(201)
第四节 赋《诗》的文化意蕴	(207)
结 语	(220)
参考文献	(223)
后 记	(230)

绪 论

先秦时期，中国文学的传统范式与民族性特征逐步确立。固然，此时的文学仍处在与意识形态的其他内容相混融的状态——文学与历史、哲学、宗教等内容互渗，共同构成为先民借以感知、思索及把握社会人生的方式，但日益丰富的社会生活与不断提高的言说水平促进了文学文本的生产，同时也加速了文学的独立成长的进程。这些客观存在的文本一方面反映了特定的思想观念，表达着作者的情感；另一方面也模铸了文学表达范式。这二者对中国文学的生成、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左氏春秋》（本书中将研究对象称为《左氏春秋》简称《左氏》一方面符合古称，另一方面也有意突出其叙事的独立品格）是这种影响的代表。这是一部记事详尽，文化蕴含深广的叙事文本。作者在礼乐文化的台基之上，以“事”为对象，以“叙”为手段，以“义”为旨归，以“人”为视点，建构了文本，也建构出一个独到的精神世界。高小康先生在论述“中国叙事观念的演变”时指出：“对于任何一个民族来说，‘叙事’即讲故事的活动都是整个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成分，它在传统的继承和社会性格引导方面往往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叙事艺术因而也就成为一个民族的艺术文化中至关重要的部分。”^①《左氏春秋》的叙事模式及叙事与义理的完美结合，确立了中国叙事散文的基本范式。美国学者柯马丁指出：“左氏的《左传》，与《春秋》联系松散，却是当时最为详尽的春秋时期的历史叙事。《左传》是前帝国时期最重要、最具魅力的历史书写，并在许多方面成为司马迁《史记》的素材来源与书写典范。”^② 经典为人类精神立法。

① 高小康：《中国古代叙事观念与意识形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② 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77页。

一部经典就是对一个时代精神的凝缩，同时影响另一个时代的精神。《左氏春秋》就是一部这样的经典文本。从观念到表达，《左氏春秋》包含了中国文学最可倚重的要素。

《左氏春秋》是一部思想内容极其丰富的经典文献。古今中外的学者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展开研究。从广义上讲，这些研究都应该是本书的研究基础，但最直接的思路来源还是那些紧紧围绕叙事展开的思索。

许多学者在文学视阈内对《左氏春秋》加以研究，将其视为叙事文学的经典著作，对其叙事成就、技法、规范等内容加以阐发。《文心雕龙》是这个领域内较早的著作。其《史传》篇云：

昔者夫子闵王道之缺，伤斯文之坠，静居以叹凤，临衢而泣麟，于是就太师以正《雅》、《颂》，因鲁史以修《春秋》，举得失以表黜陟，征存亡以标劝戒：褒见一字，贵逾轩冕；贬在片言，诛深斧钺。然睿旨幽隐，经文婉约，丘明同时，实得微言，乃原始要终，创为传体。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于后，实圣文之羽翮，记籍之冠冕也。……观夫《左氏》缀事，附经间出，于文为约，而氏族难明。及史迁各传，人始区详而易览，述者宗焉。^①

刘勰首先延续前人的论断，认为孔子作《春秋》具有深刻的文化意义。《春秋》一书的叙事语言是一种编码语言，但是由于文字简约，旨意幽深，不易理解。左丘明作为同时代的学者，全面地理解微言背后的大义，利用《左氏春秋》创立了传体，用于解释《春秋》。其叙事以经意为旨归，为文简约，但所记述的人物众多，没有清楚地记述人物家族的发展脉络。刘勰以为，这一点上，《左氏春秋》不如《史记》的列传记人既详尽又容易把握。《左氏春秋》是在编年体大的框架下，以事为核心，因事而记人。名位再高，没有值得记述的言行，《左氏春秋》不著一笔。一个家族发展的历程中，未必所有成员都是杰出的精英，也未必都有可以垂范后

^①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83页。

世的言行。因此,《左氏春秋》在家族层面上不是详尽地叙述每个家族成员的言行,重点记述那些贤者,如晋国赵氏家族的赵盾、赵衰、赵武、赵鞅,鲁国的臧僖伯、臧哀伯、臧文仲及季文子、季武子、季桓子、季平子等,这些人物影响很大,所以《左氏》重点记述,并且也不是事事皆录,而是择其大者言之。

清人刘熙载作《艺概·文概》广泛地论说古文,主要从叙事文的做法等一般文理思维出发,于《左氏》染有浓重笔墨,是相对集中论说《左氏》叙事的文论著作。刘熙载论《左氏》叙事,以书法与文义为核心,认为《左氏》开启了为文重法度的理路。刘熙载指出:

“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左氏》释经,有此五体。其实《左氏》叙事,亦处处皆本此意。^①

这是说强调《左氏》以五体建构整个叙事文本,将五体从释经之体,拓展为更具广泛意义的叙事之体。进而又提出:

《左氏》叙事,纷而整之,孤者辅之,板者活之,直者婉之,俗者雅之,枯者腴之。剪裁运化之方,斯为大备。^②

“烦而不整”,“俗而不典”,“书不实录”,“赏罚不中”,“文不胜质”,史家谓之五难。评《左传》者,借是说以反观之,亦可知其众美兼擅矣。^③

这两则材料意在论说《左氏》具体的叙事手法及整体文本的叙事成就。“剪裁运化之方,斯为大备”一语,充分肯定了《左氏》的文学创造品格及对后世文学的开源意义。刘熙载认识到《左氏》作者有意识地布局谋篇,将实录与虚饰结合。他提出《左氏》意法森严而又气象浑厚。《左传》元气丰沛的原因在于其“尚礼”所以“文赡而义明”。总体上,刘熙

① 转引自王气中《艺概笺注》,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书,第4页。

载将《左传》视为叙事散文，在此基础之上加以论说，触及了《左传》创作的基本内容。

《四库全书》及《续修四库全书》等大型文献中，都保存了大量的有关《左传》的著作。但是，这些著作基本列在经部，绝大多数是从经学角度论述。真正紧密地围绕叙事来讨论《左氏春秋》的并不多。如《文概》《左绣》等著作，都是在叙事文作品的基础上的阐发。它们指出了《左氏》的叙事手法等具体问题，但其理论延伸意义不强，限于解读叙事文本。《左氏》叙事的布局手法，剪裁运化之功固然重要，但其叙事的文化归依则是更深层次的问题。即使是手法，也要受到叙事意蕴的制约。在对《左氏》叙事的文化意蕴解读，将手法与目的结合考虑方面传统文论存在不足。我们以为仅从文章学的层面审视《左氏春秋》叙事略嫌浅显。于是，我们将视野开阔出去。与《左绣》类似的还有清代王源的《左传评》，但这些著作最明显的局限是用八股时文的观点解读《左氏春秋》。

在史学视阈内，《左氏春秋》叙述详实，堪称良史。唐代刘知几的《史通》是史学理论名著，其中《左氏春秋》是其重要的论述内容。

首先，刘知几充分肯定《左氏春秋》作为历史叙事文的成就与意义。刘氏以为：“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矣哉！”^① 这就是强调历史纂作追求简要的叙事书写理想。而在论及《左氏》的叙事品格时，刘知几指出“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②。显然，就语言简要而意义详博而言，《左氏春秋》正符合刘知几的著述理想，是经典的叙事文本。

其次，刘知几明确提出《左氏春秋》叙事模式为历史纂述体例之一。《史通·六家》云：“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惟而为论，其流有六：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③ 在具体论说时称：

《左传》家者，其先出于左丘明。孔子既著《春秋》，而丘明受经作传。盖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后人。或曰传者，传也，所

①（清）浦起龙：《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68页。

② 同上书，第11页。

③ 同上书，第1页。

以传示来世。案孔安国注《尚书》，亦谓之传，斯则传者，亦训释之义乎。观《左传》之释经也，言见经文而事详传内，或传无而经有，或经阙而传存。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信圣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①

这里强调《左氏》开创了典范的传体。“言见经文而事详传内，或传无而经有，或经阙而传存”，这是表明《左氏》叙事以《春秋》为提纲，加以详细叙述，但并不是对《春秋》亦步亦趋，而是有独到的取舍原则。“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是对《左氏》叙事为文简约却能充分展现事义的肯定。为了凸显《左氏》作为传体的典范意义，刘知几还特意以《左氏》与《公》《穀》二传作比照。在刘知几看来，《公》《穀》虽然也是传体，但难以与《左氏》比肩，“观《左氏》之书，为传之最，而时经汉、魏，竟不列于学官，儒者皆折此一家，而盛推二传。夫以丘明躬为鲁史，受经仲尼，语世则并生，论才则同耻。彼二家者，师孔氏之弟子，预达者之门人，才识本殊，年代又隔，安得持彼传说，比兹亲受者乎！加以二《传》理有乖僻，言多鄙野，方诸《左氏》，不可同年”。^②刘知几以为《左氏》文本产生较早，最能接近孔子的本意。而《公》《穀》二传师法于仲尼弟子门人，年代隔绝。并且二传论理乖僻，语言粗鄙，实在不能与《左氏》同日而语。刘知几对《公》《穀》的评价当否暂且不论，其对《左氏》传体典范性的推重可见一斑。

《史通·六家》在概述《左传》家的历史影响时，进一步厘定其传体的内涵：

逮孔子云没，经传不作。于时文籍，唯有《战国策》及《太史公书》而已。至晋著作郎鲁国乐资，乃追采二史，撰为《春秋后传》。其书始以周贞王续前传鲁哀公后，至王赧入秦，又以秦文王之继周，终于二世之灭，合成三十卷。当汉代史书，以迁、固为主，而纪传互出，表志相重，于文为烦，颇难周览。至孝献帝，始命荀悦撮其书为编年体，依《左传》著《汉纪》三十篇。自是每代国史，皆

①（清）浦起龙：《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0页。

② 同上书，第204页。

有斯作，起自后汉，至于高齐。如张璠、孙盛、干宝、徐广、裴子野、吴均、何之元、王劭等，其所著书，或谓之春秋，或谓之纪，或谓之略，或谓之典，或谓之志。虽名各异，大抵皆依《左传》以为的准焉。^①

刘知几认为《左氏》之后的历史纂述日益繁复，难以周览。而荀悦依据《左氏》的编年体，著《汉纪》三十篇。此后，历代均有准据《左氏》编年体的著作出现。据此，清人浦起龙解刘知几的《左传》家为编年正体。那么，《春秋》也有编年的形式，且早于《左氏》，为什么刘知几将编年体之祖确定为《左氏》，而将《春秋》定义为记事家？浦起龙解释：“《春秋》经以提纲，传以述事，事必系年，编年之法，由是兴焉。然编年之意，《史通》不以系经而系传者，事待传而显也。传有三家，《史通》唯取《左氏》，不及《公》、《穀》者，《公》、《穀》主释义，《左》主载事，《公》、《穀》非史法，《左》具史法也。故《左传》一家为编年家法之祖也。”^② 刘知几和浦起龙将《左氏》与《春秋》视为截然不同的文体，这种做法有不足与牵强之处。但我们由此看出，编年体是一种以年时月日系事的行文格式，其建构的文本归根结底还是叙事文，要将史事详尽地叙述出来，完整地表达事义。如果编年体历史叙事没有深入的事义阐发，则如流水账般无味了。这样看，刘知几和浦起龙，与其说是推重《左氏》为编年正体，莫不如说是肯定《左氏》以叙事为主的体式特征。

其三，刘知几认为《左氏》叙事与《春秋》相比，更具有彻底的良史品质。刘氏对《春秋》提出明确的质疑，为《左氏》张本。《史通·申左》云：

寻斯义之作也，盖是周礼之故事，鲁国之遗文，夫子因而修之，亦存旧制而已。至于实录，付之丘明，用使善恶毕彰，真伪尽露。向使孔《经》独用，《左传》不作，则当代行事，安得而详者哉？盖语曰：仲尼修《春秋》，逆臣贼子惧。又曰：《春秋》之义也，欲盖而彰，求名而亡，善人劝焉，淫人惧焉。寻《左传》所录，无愧斯言。

① （清）浦起龙：《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1页。

② 同上书，第12页。

此则《传》之与《经》，其犹一体，废一不可，相须而成。如谓不然，则何者称为劝戒者哉？儒者苟讥左氏作《传》，多叙《经》外别事。如楚、郑与齐三国之贼弑，隐、桓、昭、哀四君之篡逐。其外则承告如彼，其内则隐讳如此。若无左氏立《传》，其事无由获知。然设使世人习《春秋》而唯取两《传》也，则当其时二百四十年行事茫然阙如，俾后来学者兀成聋瞽者矣。^①

在刘知几看来，《春秋》只是保存了一些鲁史旧闻，而《左氏》通过叙事，使善恶真伪彰显无余，真正贯彻了实录精神。没有《左氏》的详尽叙事，则后世学者难以理清春秋时代的历史。刘知几对《春秋》的疑惑及对《公》《穀》二传的批评，启发我们认识《左氏春秋》叙事的独立的文本精神。

除《史通》外，还有分类检索式的著作，如清代马驥作《左传事纬》，从《左传》的文本内容出发列出条目，诸如：“逸诗”“歌”“讴”“诵”“谣”“铭”，等等，对《左传》加以检索归纳。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将同一类事件统归一处，这样有助于对一事件经过认识清楚，不致含混。韩席的《左传分国集注》，对《左氏》作国别分类。史学家们对《左氏》所叙述的史实内容的条贯清理，可帮助我们解读文本。史学视阈里的《左氏春秋》研究，从历史叙事纂作的角度，帮助我们深刻寻绎《左氏春秋》叙事文本的建构模式与意义指涉。进而，我们发现文学史家的洞见常常有兼顾文、史的境界，带来很多启发。

在文学史类著作中，杨公骥先生的《中国文学》（第一分册）对《左氏春秋》的论说是最具特色且异常深刻的。杨先生将文学史叙述、考据、说理、选文译释融于一炉，将《左氏春秋》的相关问题阐述得异常深入，而且经常有惊人之语，读之使人拍案。

杨公骥先生认为：“《左氏春秋》是公元前五世纪的历史巨著，原是先秦的许多种‘春秋’（史书）之一，因此战国时人或西汉时人往往也称之为‘春秋’。以后，为了不与孔子所修订的《春秋》相混，故称作《左氏春秋》。”^② 又称：“根据《史记》记载，左丘明曾因袭《春秋》纲目从

① （清）浦起龙：《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421页。

② 杨公骥：《中国文学》（第一分册），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92页。

事史书著作，这就是说，参照了《春秋》所记的大事，并使用了‘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的记事方法。但他并非一本《春秋》。从《左氏春秋》中可以看出，作者曾博览了各侯国的史书和文献资料，同时也广泛地搜集了野史遗闻，并将文献史料和口头传说溶汇在一起作了文学的加工，从而写出一部独创的具有文学价值的历史巨著。”^①学术界普遍认为《左氏春秋》产生于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以前的鲁国。先秦时期的文献成书的通例是某一文本几经流传口述，修改增益，最后写定。在《左氏》产生之前，鲁国的知识界中，鲁国史官所记述的《鲁春秋》及孔子所修的《春秋》都已经存在。左丘明作为鲁国的重要史官和思想者必然要通观备览之。《左氏》文中“书”“不书”等语表明作者对前在文本有所解说，但无证据表明《左氏》创作的目的是完完全全为了解释孔子的《春秋》。因此，在确凿的新材料出现之前，我们暂且放开有关作者及释经与否的纠缠。将其文本称为《左氏春秋》，这既符合文献原貌，也突出了文本的独创品格。

杨先生指出了《春秋》的经典意义。《春秋》“提供了集中而简明的记载事件的样式”，“提供了提炼语言的方法，并楷模的使用了语言”，“提供了叙述事件的合乎逻辑合乎情理的方法”^②。当然，先生也指出“《春秋》不是文学作品，它是通过概念记录事件，并不是以形象反映现实”。^③真正详尽生动地描写历史事件和贵族生活的文学作品是《左氏春秋》。

《左氏春秋》与《春秋》相比，二者生成的时空接近，又同样面对一个新旧文化纷争的春秋时代，但《左氏春秋》叙事超越了《春秋》的文化观念。在详尽叙事的同时，《左氏春秋》展现了完整的合乎人类理性发展的人性品格。更重要的是，《左氏春秋》已经具备文学文本的品格。

（一）叙事详尽

与《春秋》相比，《左氏春秋》叙事详尽，给我们充分认识问题提供了前提。《左氏》面对春秋时代的文化新变，没有采取排斥的态度，而是将新生事物与文化现象详尽地叙述下来。杨先生指出：“《左氏春秋》是

① 杨公骥：《中国文学》（第一分册），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94页。

② 同上书，第388—389页。

③ 同上书，第390页。

部包罗万象的史书。它广泛而详尽地描写了历史大事件和当时的贵族政治生活。这就为我国历史著作奠定了基石。”^①由此可见，详尽叙事绝不仅仅是文本篇幅的延长，其实质是历史叙事观念的超越。

（二）形象加工

与《春秋》相比，《左氏春秋》更具有文学作品的情味。它对某些历史事件不是只记其因果现象而是作了形象的描绘。它不是“客观”的所谓“实录”，而是凭借了作者的生活感受和想象作了铺排和夸张。杨公骥先生概括为：“《左氏春秋》的特征是：有着合理的夸张，有着形象创造，丰富而多彩，比较通俗，有着雄伟的风格。”^②

形象加工的重要内容在于对人物性格的描绘。“虽然《左氏春秋》作者还不善于对人物性格的全部特征作生动的描写，但不难看出，作者在所描绘的事件中却表现了人物性格的要素。也是基于对人物性格要素的描写，所以事件情节才能人情合理的展开。”^③杨先生着重论说了贵族政治矛盾中的人格形象。他深刻地分析了诸多贵族的性格特征，并且论述了其性格特征生成的原因。针对“郑伯克段”，先生指出郑伯和共叔段的母亲武姜作为母亲却憎恨难产的儿子郑伯而溺爱顺产的儿子共叔段，这正是弟兄间矛盾的起因。而武姜之所以会如此行事的原因正在于她作为贵族的极端自私和伪善。“武姜是在‘自私教养’下长大的，她根据极端的‘个人利害’来决定对人对事的看法与态度——甚至对亲生儿子也不例外。她将自己的安适舒泰看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此，“她是根据自己坐骨神经的感觉，来决定对儿子的爱与憎的”。^④此外，杨先生列举了很多极具代表意义的事件。在“楚商臣弑父”中，先生指出了商臣的极端自私和异常冷酷；在“崔杼弑君”中，先生指出齐庄公就是一个好色淫乱、贪生怯懦的君主；在“郑公子归生弑灵公”中，先生指出公子宋有着反常的自尊心，因一块鼋肉而弑君。

《左氏春秋》的作者将详尽叙事和形象加工视为传达理念和认识的手

① 杨公骥：《中国文学》（第一分册），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95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书，第399页。

④ 同上书，第400页。

段。作者在叙事中不是保守地维护周礼，而是呈现出思想认识的进步性。《左氏春秋》的叙事并不是一味维护等级身份，而是将贵族统治者的一切丑行暴露无遗。客观上，《左氏春秋》“不仅使‘乱臣贼子惧’，而且也使乱君贼父惧”。当然《左氏春秋》也对诸多的具有进步意义的形象加以塑造。这样的叙事，已经超越了周代礼乐制度下的等级化观念，甚至其进步意义是后代很多历史作品所难以企及的。

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代表了文学史研究的最新进展。撰写人钟涛先生在论说《左氏春秋》时称：“与《春秋》一样，《左传》不只是对历史事件作客观的罗列，而且还表达了对历史事件的认识和理解，并站在儒家立场上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作出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道德伦理评价，为人们提供历史的借鉴。《左传》维护周礼，尊礼尚德，以礼之规范评判人物。同时，作者以敏锐的历史眼光，记述了周王室的衰落和诸侯的争霸，公室的卑弱和大夫兼并，表现了新旧政治势力的消长，揭示了社会变革的趋势。书中还揭露了暴虐昏庸、贪婪荒淫之辈，肯定赞扬了忠良正直之士，尤其是重民、以民为本的思想，更反映了《左传》进步的历史观。在《左传》作者看来，有德才能为天所佑；得民或失民，被有识之士当作取国或灭国的重要条件；在人与神的关系上，人的地位提高了；在君与民的关系中，民的地位提高了。”^①接着，又对《左传》的叙事、写人、记言等内容展开论说。

哈佛大学特级讲座教授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先生是知名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学者。他的一篇题为《叙事的内驱力》的文章主要以《左传》为研究对象，论述叙事的内驱力，“是谁或者是什么，对事件的发生负责？这又如何结构和定型整个叙事？”^②文章的铺垫部分几经纠结。作者首先指出16世纪以来，《左传》以“短小的选节”的形式“以其精炼而富有刺激性的笔墨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是如果孤立地看，它们却难以传达整个《左传》的典型叙事特色”。可是在探索《左传》整体典型特色的初始阶段，宇文所安似乎又遇到困惑，那就是“《左传》的叙事极为复杂，但是其叙事核心都是暂时性的，情节也很支离破碎，缺乏把整个叙事统一为有机整体的力量”。而欧洲的历史叙事“在很大程度上被故事

① 见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一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76页。

② 宇文所安：《他山的石头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4页。